

# 加勒比地区史

(1492—1969年)

---

[特] 埃里克·威廉斯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 从哥伦布到卡斯特罗： 加勒比地区史 (1492—1969年)

## 下 册

[特] 埃里克·威廉斯著  
辽宁大学经济系翻译组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76年·沈阳

## 第十六章

255

## 海地革命后的殖民 主义与奴隶制

1783年，英国首相诺思勋爵在答复教友派信徒提出的废除奴隶贸易请愿书时，公然为奴隶制辩护，他说：废除奴隶制是不可能的。四年后，他的继任者威廉·庇特敦促自己的朋友威尔伯福斯提出废除奴隶制的议案，他自己热烈地支持废奴运动。

这个变化的第一个解释是十三个大陆殖民地脱离了联邦，从而减少了帝国的奴隶人口并引起对英属西印度的重要性的重新估价，这个重要性从来都是无可置疑的。乔赛亚·塔克牧师把殖民地称做套在不列颠颈上的磨盘。1788年，废奴派托马斯·克拉克森写道：

“只要美洲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大臣就不能

有机会倾听非洲儿女的呻吟，即使他可能同情他们的不幸。同是这块地方（在那里对解救那些不幸者一度造成一种不可克服的障碍），经过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事件变化，我们碰到的障碍被排除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前景，即把解除他们的痛苦作为我们的一项政策。”

第二个解释是圣多明各和其他法属岛屿的优越性，<sup>256</sup> 不列颠通过英属岛屿奴隶的再输出促进了这些岛屿的发展。

因此，英国废奴运动的兴起是有其政治和经济基础的。1787年，废奴派成立了一个协会，后来称为反奴隶制协会。威廉·威尔伯福斯是议会中废奴派的领袖，他的地位是由于他的道德崇高又擅长词令而取得的。但在废奴运动的早期，这一运动的推动力来自首相威廉·庇特。同庇特和威尔伯福斯在一起的还有大演说家亨利·布鲁厄姆，他写的论欧洲列强的殖民政策一书中特别谈到了圣多明各的优越性。

托马斯·克拉克森是议会外最杰出的废奴派，废奴运动的领袖。当他在剑桥大学当研究生时，因写了一篇论文得奖，而成名。论文的题目是：“使

人违反他们自己的意愿去当奴隶是合法的吗？”后来，他的这篇论文被出版成书，成为废奴论的名著之一，书名改为《论奴隶制和贩运人口，特别是贩运非洲人》。克拉克森是废奴运动研究工作的指导者，他的另一篇主要著作《论非洲奴隶贸易的失策》是进行宣传战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

除克拉克森，另有三个作者具有对西印度奴隶制的亲身阅历的有利条件。他们是詹姆斯·拉姆齐牧师、扎卡里·麦考利和詹姆斯·斯蒂芬。麦考利是十九世纪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的父亲，是聚集在克拉彭地方，后来被称为“圣徒”的宗教派别一帮人当中的一个中心人物。然而，麦考利本人所关心的是印度甘蔗种植的发展。斯蒂芬的儿子是第一任永久性的殖民副大臣，享有名望，是文官中一个杰出的模范人物。

废奴派集中抨击奴隶制的失策。他们的第一个论点是英属西印度人口极为稠密，奴隶贸易已没有必要。庇特引用了对枢密院所提出的问题的答复，指出：1788年，牙买加的死亡数仅超过出生数的1%，巴巴多斯的奴隶人口似乎在增长，圣<sup>257</sup>基茨的人口减少数不到1%，多米尼加的出生数超

过死亡数。威尔伯福斯抨击奴隶制时说：牙买加奴隶人口减少数，从1698年到1730年为3.5%，从1730年到1755年为2.5%，从1755年到1768年为1.75%，从1768年到1788年最高不超过1%。马克·吐温说这些统计数字中有虚假，咒骂为弥天大谎和可恶的统计，无疑他是把上述统计数字铭记在心里的。庇特和威尔伯福斯利用每年从非洲大量输入数字为根据的人口统计数字，来证明人口是按自然规律在上升的。加勒比地区后来的全部历史，如它先前的历史一样，暴露出他们的统计数字不真实，证实了奴隶制需要奴隶贸易，而只要某种形式的强制的、非自由的劳动被认为对甘蔗种植必不可少，那么奴隶输入就不能废除。

废奴派的第二个论点是对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劳工优越性的命题的推广。正如亚当·斯密是工业革命的拥护者那样，阿瑟·扬格是英国农业革命的拥护者，他谴责在甘蔗种植中使用奴隶劳动，是“最昂贵的人类劳动”，世界上劳动生产率最低的一种劳动，他能够想象出哪一种自由劳工制都比非洲奴隶制合算。扬格尖锐地说：只是因为存在奴隶制，才使种植园主宁愿采用“举世闻名的

最不合理的耕种方式……种植园里的工头比起支使牲口来更喜欢支使奴隶”。

庇特是亚当·斯密的好学生，在一次宴会上他对亚当·斯密恭维一番说：“我们都是你的弟子。”1791年，他在一篇热情的演说里声称：“哪个地方有荣誉、信任和相当的利润作刺激，哪个地方就会有产业。”次年，他滔滔不绝地说：“如果你使这个退化了的种族恢复人类的真实感情，如果你把他们和禽兽一类区别开来，把他们放到和其他人类相同的地位，他们将会以人类天生的那种活力去工作，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将会在各方面超过现有的生产水平；因为一个人的劳动生产率总比一头牲畜高多了。”<sup>258</sup>他接着说：如果一个黑人是自由劳工而不是奴隶，他的劳动生产率简直会增加一倍。据1789年枢密院的报告中所作的估计，自由劳工和奴隶劳工的生产率之比是三比一。

废奴派所提出的第三个论点是：奴隶贸易那样长期地被当作英国海员的养成所和英国海军的学校而视为正当，备受赞扬，实际上它是受雇用的水手们的坟墓。据克拉克森讲，奴隶贸易每年夺去二千名英国水手的生命，为纽芬兰贸易中的死亡

率的二十倍。他说：“因此，如果我们对于海员的生命还有一点关心的话，就应该抛弃这一部门的贸易，这种贸易是那样无益地消耗着人力。”1791年，爱用统计资料的威尔伯福斯向下议院提出报告说：三百五十艘贩奴船共有海员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二人，一年内的死亡数达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另一方面，从事蔗糖贸易的四百六十二艘船，共有海员七千六百四十人，在七个月内死亡数仅一百一十八人。

第四，废奴派不认为奴隶贸易是国家财富的一个巨大来源，不认为废除奴隶贸易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在他们看来，英国对非洲平均每年价值五十万英镑的出口“不是那样重要，可不给予重大的考虑”。废奴派认为，“用一种犹太小贩也会觉得脸红的欺骗方式”进行的一种不过是输出粗劣的棉织品、小饰物、刑具、劣等甜酒或武器（后者，威廉·史密斯讥笑说，“无疑地是为了在非洲部落当中维护和平和促进文明的目的”）的贸易，就是找到一个拥护者也是耻辱。废奴派作出结论，用拉姆齐的话来说，“非洲贸易的利益比通常所想象的更为有限，而且近年来它对于增强我们的对手比

增进我们的国民财富贡献更大。”

废奴派提出的最后论点，表示完全废弃英国直至1783年对蔗糖殖民地所采取的政策，并在加勒比地区史中引入了一个从那个时代起就成为蔗糖生产者的幽灵的东西——生产过剩。1792年种植园主的一位辩护士向上议院抱怨说，正当英国<sup>259</sup>种植园主由于圣多明各奴隶革命的爆发而放弃他们地力耗尽的土地去开垦荒地的时候，却告诉他们不能再进行奴隶贸易了。

废奴派想要加以制止的正是这种新耕地。庇特对这一点特别关切。1788年，他给威尔伯福斯的一封信中说，奴隶贸易的废除将“只会阻止那些本来可以实现的进一步的改良，而不会侵犯现存的利益”。如在海关工作的欧文先生1791年在下议院一个委员会上作证时所说的，英属西印度生产的蔗糖和甜酒超过了英国所需要的消费量，所以这种生产如不超过竞争价格的15%就不能再进行生产，再去促进这种生产的发展也是不明智的。他建议种植粮食作物和饲养牲畜，威尔伯福斯敦促种植园主把新增的土地都用来种植棉花和肉桂。

但是，在英国既得利益还是庞大的。利物浦带

头进行斗争。从1783年到1793年间八百七十八艘利物浦船只载运奴隶共三十万三千七百三十七人，价值估计为一千五百一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英镑。从1795年到1804年间利物浦有贩奴船一千零九十九艘，载运奴隶达三十二万三千七百七十人。这样，在1783—1804年期间，除1794年没有数字外，单利物浦一地就用了一千九百七十七艘船，载运奴隶六十二万七千五百零七人。这相当于每年平均船只九十四艘，载运奴隶略少于三万人。

奴隶贸易决不象废奴派所声称的那样，不代表国家的重要利益，它仍然是利物浦地位的基础。仅1798年一年内利物浦的贩奴船就有一百五十五艘，载运奴隶达到五万七千一百零四人的巨大数字。1795年，这个城市的每四艘船中就有一艘从事奴隶贸易。利物浦垄断了英国奴隶贸易的八分之五，欧洲奴隶贸易的七分之三。利润额是巨大的。1802年“洛特里号”载运奴隶共三百零五人，从每一奴隶获得的平均利润为三十六英镑；1803年，“企业号”载运奴隶共三百九十二人，平均利润为十六英镑；“路易莎号”载运奴隶三百二十六人，<sup>260</sup> 平均利润为二十六英镑。按每一奴隶的平均利润二

十六英镑计算，那么这一时期利物浦奴隶商运输奴隶而获得的利润超过一千六百万英镑。

如一般的说法那样，如果把企业比做发行彩票，那么这种发行是否受人欢迎要看企业的利润了。1795年一位当地的历史学家写道：

“每年这笔巨额的利润，可以说，渗透到整个城市，增加了大投机家的财产并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支持。在利物浦，几乎人人都是商人，如果他们不能运送一个大件的捆包，也要运送一个小件的硬纸盒。因此，诱人的非洲流星时时在居民的思想里闪耀着，几乎每个阶层的人都对几内亚船货感兴趣，这是毫不足怪的。人们所以看到那样多船只，就是因为这种商业风靡一时……”

这位历史学家继续写道：这些小帆船，每艘运进奴隶约一百人，是由小律师、布商、杂货商、油商、理发师、成衣匠等装备的。有的人持有八分之一股，有的人十五分之一股，有的人三十二分之一股。

不管废奴派怎么说，利物浦居民是知道他们的面包在哪一面涂黄油的。1789年，铁、铜、黄铜和铅的制造者和商人，住在城市里的蔗糖殖民地的种植园主、商人、承受抵押者、领受养老金者和放

债权人、帆工和面包师傅、细木匠、造船匠、制绳者、箍桶匠、造枪炮者、印版制造者，还有市长、市议会的长老议员、司法官和镇议会里的人——这支庞大的既得利益队伍，单在5月20日这一天就提出不下十二封请愿书，反对废除奴隶贸易，理由是：奴隶贸易的废除将会使许多“孤单的流浪者走向世界，到国外寻找工作”，给这个城市带来普遍的穷困。

对利物浦的支援来自不列颠其他商业和制造业中心，特别是布里斯托尔和伦敦。1789年西印度种植园主和布里斯托尔商人、大制造商、造船匠、船主和贸易商，提出请愿书，反对奴隶制的废除。请愿者指出，奴隶和蔗糖贸易在布里斯托尔的贸易额中占五分之三。伦敦的各类商人、船主、制造商和零售商，伯明翰的各类制造商和曼彻斯特的

<sup>261</sup> 非洲货物的制造商都联合起来反对废除奴隶制。

上议院是在外种植园主和奴隶贸易商的支持者，它行使有效制止权，反对废奴运动。威斯特摩兰伯爵提醒贵族说，他们在上议院的席位归功于奴隶贸易。海军是完全维护奴隶制的。皇室的一员、当海员的克拉伦斯公爵攻击威尔伯福斯不是

一个宗教狂，就是一个伪君子。在牙买加拥有奴隶的圣文森特伯爵描绘废奴论是“可恶的、有害的学说，只有伪君子才坚持它”。他表达这种见解，对黑人来说，种植园的生活同他们在非洲的生活相比较是真正的天堂。罗德尼反对废奴派。纳尔逊在尼维斯岛娶了一位西印度女继承人（到那里的游客至今仍请观看纳尔逊的结婚登记）。他明确地维护旧秩序说：

“我是从古老的好学校教养出来的，它教育我要尊重我们西印度人的财产。当我还有力量为保卫他们而战时，当我还能发表意见驳斥威尔伯福斯及其伪善者同伙的邪说时，不论是在农田还是在上院，西印度人的正当权益不容受到侵犯。”

感恩戴德的种植园主在牙买加的西班牙城为罗德尼建立了一座塑像，在巴巴多斯的布里奇顿为纳尔逊建立了一座塑像，在布里奇顿命名特腊法尔加尔广场，在安提瓜岛保存纳尔逊船坞，这些都不仅仅是这两位将军在西印度某些岛屿和特腊法尔加尔<sup>①</sup>获得巨大胜利就能解释的。

<sup>①</sup> 特腊法尔加尔 (Trafalgar) 角在西班牙海岸，加的斯东南，1805年纳尔逊指挥英国舰队战败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于此。——译者

反对废除奴隶制的力量虽然强大，但不足以说明从1787年到1807年二十年来废奴派为什么没有达到目的的失败原因。真正的解释在圣多明各。庇特和英国政府一接受法国殖民地种植园主的提议，英国废奴运动就被判处死刑了。在取得圣多明各后，英国蔗糖帝国又受到了重视。没有奴隶贸易，圣多明各对帝国则是没有用处的。英国政府着重地向圣多明各的种植园主保证，奴隶制和奴隶贸易都将延续下去，混血种人仍将保持原有地位。一旦庇特决定并吞圣多明各，用印度蔗糖去夺取欧洲市场的政策就没有必要了。根据同样理由，<sup>262</sup> 不列颠废除奴隶制不仅已不必要，而且是发狂。

1792年，同法国开战以前，威尔伯福斯在他的日记里预示地记道：“庇特为了圣多明各而抛弃了废奴的动议。”庇特继续发言支持废除奴隶制——他的许愿是非常坦率的——但他的支持却是敷衍了事。1796年，他劝告威尔伯福斯推迟一年一次的动议。1797年，庇特企图让他的朋友接受一种折衷办法——即由殖民地的立法机关去采取改善措施——因遭到威尔伯福斯的拒绝，如后者所记述的，庇特“勉强地”站在他一边。

历史课本告诉我们，庇特害怕所有的改良措施会带有激进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的意味。他可能是这样。但是庇特不能要圣多明各同时又要废除奴隶制。于是他接受了圣多明各，为了取得这个西印度成熟的梅子，花费了无数的金钱，牺牲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放弃了对奴隶制的废除。正是为了相反的理由，如我们所看到的、波拿巴以前的法国政府转而废除了奴隶制，使奴隶得到解放。

因此，在1792年以前，首相庇特由于直言不讳地支持废奴制曾破除了一切政府的、家族的传统，而恰恰在他执政的时期，英国的奴隶贸易达到了顶峰。英国开往非洲的船舶1793年为一万九千四百九十三吨，1800年增加到三万八千九百六十六吨，正好一倍。这一时期的年平均数是三万五千吨。到德萨利兰宣告海地独立时，英国奴隶贸易中所包含的既得利益和1787年废奴运动开始时相比较已变得不可比拟地更加庞大了。

圣多明各改变英国废奴制实况的深度，从废奴派试图实现早期废奴运动中最能为人普遍接受的要求，阻止奴隶运往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这些被征服的岛屿一事中充分地显露出来。这是在

庇特的权力之内，通过内阁的一道简单的命令就能做到的事情。这和他早些时候对新垦殖带来高死亡率的批评，和他限制西印度生产的愿望是协调一致的。于是威尔伯福斯力劝他发布这样一道<sup>263</sup>命令，庇特动摇、踌躇和拖延。最后，他对特立尼达提出了一项妥协办法：禁止奴隶贸易，但准许把奴隶从较老的岛屿迁移过来。

威尔伯福斯意识到英属圭亚那对老的西印度岛屿的影响，意识到这个广大地区在全面开发后可能发生的影响，对它表示更大的关切。因为这个缘故，他得到许多西印度种植园主的支持。威尔伯福斯再三恳求，庇特只需要举行半个小时的会议发布一道命令就行，如果不发布这道命令，他在自己党里必定要受到抨击。庇特仍旧加以拖延，威尔伯福斯发怒了。当庇特真的散发一道命令的草稿时，它又是那样令人不满意，以致威尔伯福斯要求他不要公布。威尔伯福斯继续不断地又喊又写，又写又喊，毫无结果。

庇特早一些时期的热情冷淡到了这种程度，1802年他不出席威尔伯福斯的一年一度的提案的辩论会。次年他再试图使威尔伯福斯把这个会延

期；遭到拒绝后，庇特在辩论会上默不发言。然而，1804年，庇特催促西印度人同意在被征服的岛屿上废除奴隶贸易，这一步骤正是他曾拒绝采取的步骤。他现在的论据是：新殖民地是老殖民地的竞争者，黑人人口急剧增加是一个危险，同时西印度当前生产的蔗糖超过在世界市场上可能出售的数量。首相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

对威尔伯福斯最大的打击是庇特在塞拉利昂禁止奴隶贸易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废奴主义者在塞拉利昂曾建立了一个侨居地，把在英国由曼斯菲尔德勋爵对萨默塞特案件的判决而获得自由的黑人迁送到那里，并在那里开始与非洲进行合法贸易，庇特对此表现出非常冷淡的态度。1799年，废奴派的一个议案被提出进行辩论。威尔伯福斯在日记里写道：“令人震惊地见到庇特和所有其余的人都反对在部分非洲海岸禁止奴隶贸易的议案，象是反对全部废除奴隶贸易一样，哀哉！”当威尔伯福斯表示，他愿意回答庇特的误解时，庇特宣告辩论会休会。

詹姆斯·斯蒂芬谴责庇特的观点不直截了当、自私。他在写给威尔伯福斯的信中说：“庇特先